

华夷圣俗间际

——日本南诏学研究述评

席会东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9)

【摘要】 日本学界的南诏史研究肇兴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20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形成两个研究高潮。从研究取向来看,日本学界的南诏史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的研究领域:一是以牧野巽、白鸟芳郎为代表的“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视角下的南诏民族史和历史语言研究,其主要内容是探讨南诏的族群结构与各族群的语言类型及其与现代大理地区各民族及其语言的关系;二是以藤泽义美、林谦一郎为代表的“政治制度史”取向下的南诏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其核心内容是探讨南诏的立国基础,南诏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阶层,南诏与唐、吐蕃关系,南诏的对外战争与都城变迁;三是以武田史子、今井净圆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史”取向下的南诏宗教史和艺术史研究,其主要内容是探讨南诏的佛教史、佛教艺术、佛教与政治关系等。在与中国和西方学界充分交流的基础上,日本学界三种取向的南诏史研究都取得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成果,但也都存在不足之处;南诏史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 南诏史 日本 民族学 政治制度史 思想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 K91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席会东(1981—),男,河南巩义人,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城市史、地图史、边疆史地、中外交流史研究。

一、日本南诏学源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明治维新并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的日本,逐渐建立起近代学术体制,深受西学影响的日本历史学者开始以强者的目光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力图构建起全新的东洋史体系。20世纪上半叶,受日本扩张主义国家战略、西方学术潮流双重影响的日本史学界展开中国“边塞史”、“西域史”、“征服王朝”的研究,力图从中国周边发现历史进而从中国周边构建历史,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东洋史学者先后在中国东北、北方、西北地域史和满、蒙、维、藏及突厥、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与此相对的是,包括南诏、大理在内的中国西南区域史和民族史并未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除了中国通史中有关南诏的通论性和概述性介绍外,鲜有关于南诏史的专论和专著问世。20世纪4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向东南亚扩张,一些日本学者开始关注东南亚历史。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的中国史学界不再因侵略中国的战略需要而集中于北方边疆民族史研究,而是以更为广阔的

学术视野来审视中国,包括南诏史在内的西南区域史和民族史也开始受到日本历史学者的关注,经历几十年的积累逐渐形成富有日本学术特色的南诏史研究。

日本的南诏史研究肇兴于20世纪40年代末,后于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至今形成两个研究高潮,在民族史、制度史、宗教史等领域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就其研究范式来看,日本的南诏史研究受到由白鸟库吉等人开创的“东京文献学派”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文本分析和实地考察。从研究取向来看,日本的南诏史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的研究领域:一是以牧野巽、白鸟芳郎为代表的“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视角下的南诏民族史和历史语言研究,其主要内容是探讨南诏的族群结构与各族群的语言类型及其与现代大理地区各民族及其语言的关系;二是以藤泽义美、林谦一郎为代表的“政治制度史”取向下的南诏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其核心内容是探讨南诏的立国基础,南诏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阶层,南诏与唐、吐蕃关系,南诏的对外战争与都城变迁;三是以武田史子、森雅秀、今井净圆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史”取向下的南诏宗教史和艺术史研究,其主要内容是探讨南诏的佛教史、佛教艺术。在与中国和西方学术界充分交流的基础上,日本学界三种取向的南诏史研究都取得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成果,但也都存在不足之处;从总体和长远来看,南诏史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从国际南诏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来看,日本是中国之外的南诏研究重镇,在南诏研究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然而截至目前,笔者尚未见到有学者对日本的南诏史研究进行全面的归纳总结,而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鲜为国内学者所知。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学术源流、研究领域、视角方法、成就不足等方面对日本的南诏史研究进行分析梳理和归纳述评,以期推动中日南诏史研究的交流与国际南诏史研究的进展。

二、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视角下的南诏民族史研究

20世纪40年代后期,战后的日本东洋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区域史研究发生重要转向:一方面是中国北方边疆与民族史研究因日本侵华的失败和数十年成果的积累而不再成为日本东洋史学者的唯一焦点,另一方面是二战后期日本在东南亚的扩张和寻找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使得中国西南区域史和民族史成为日本学者新的研究课题。20世纪40年代以来,由日本民族学协会主办的《民族学研究》成为日本南诏史学者发表其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而日本民族学协会则是由日本民族学泰斗白鸟库吉于1934年发起创办并担任首任理事长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学家牧野巽和日本民族史、民族学家白鸟芳郎对南诏民族史和历史语言所做出的卓越研究则正式开创了日本的南诏史研究,并奠定了日本南诏史的研究基础。

牧野巽(1905-1974)是日本昭和时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先后在大阪大学、早稻田大学任教,以中国宗族和家族研究而知名。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先是在《民族学研究》发表《南诏·大理·民家之语言》(1949)、《云南民家族的祖系传说》(1950)两文,后又在《东洋学报》上分上、中、下三篇发表了《南诏大理的遗

民》(1950~1951)一文,对南诏、大理和民家(白族)的族属与语言及其关系进行了长时段研究^①,从而揭开了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视角下的南诏史研究序幕。他根据李京《云南志略》残卷记载认为大理遗民白人的词汇与当今的民家语汇相一致,又根据唐樊绰的《蛮书》进一步认为南诏的词汇与当代及元代的民家词汇多有类似之处,从而推断南诏、大理和民家的语言属于同一语组,即藏缅语,南诏也并非是由傣族人建立的政权。他认为民家是南诏和大理人的直系后裔,其所用的语言属于藏缅语。元明以来,白族逐渐被汉化并被称为民家,并形成了民家是自南京徙入云南的汉族后裔的传说。

白鸟芳郎 1918 年出生于东京的一个日本东洋史学世家,其祖父就是赫赫有名的日本东洋史泰斗、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其父亲白鸟清也是日本东洋史专家,自幼就深受家学熏陶,立志从事东洋史研究^②。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学习期间,他受到和田清和加藤繁两位教授的指点,先从事东北亚史学习和研究;后受到山本达郎的影响,开始对华南和东南亚民族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以《汉代对南越之经略》为毕业论文从东洋史学科毕业^③。从 1949 年 4 月,他进入上智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担任讲师,并于 1951~1953 年间在《民族学研究》上先后发表《南诏及大理的民族及其遗民民家的语言系统》(1951)、《乌蛮与白蛮的所在地与白子国及南诏六诏之关系》(《云南的蛮族:乌蛮与白蛮》之一,1953)、《南诏、大理的居民与爨、僰、罗罗、民家诸族之关系》(《云南的蛮族:乌蛮与白蛮》之二,1953)研究的三篇系列论文^④,对南诏、大理政权的居民族属及其语言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乌蛮和白蛮是云南地区的两个主要族群,乌蛮所用的语言属于与傣(罗罗)人和摩梭人相似的藏缅语,而白蛮所用的语言则是现代云南南部边境地带仍在使用的的一种傣语,这一观点与牧野巽不同。他认为唐代南诏政权的建立者属于乌蛮,而大理政权的建立者则属于白蛮。至于民家是南诏和大理人的后裔,其祖先是唐代之前云南讲傣语的白蛮或白族,尽管白蛮在乌蛮建立的南诏政权统治下受到藏缅语和乌蛮文化的影响,但白蛮仍然保留了自身

① 牧野巽:《南诏·大理·民家の言语》,日本民族学协会编《民族学研究》14(2),115-127,1949-12;牧野巽:《云南の民家族の祖系传说》,《民族学研究》14(3),210-219,1950-02;牧野巽:《南诏·大理の遗民》(上),《东洋学报》32(4),413-432,1950-04;牧野巽:《南诏·大理の遗民》(中),《东洋学报》33(1),75-91,1950-12;牧野巽:《南诏·大理の遗民》(下),《东洋学报》33(2),245-261,1951-01。

② 金少萍:《白鸟芳郎与中国南方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 年 4 期,第 44-49 页。

③ 白鸟芳郎教授古稀纪念论丛刊行会:《白鸟芳郎教授古稀纪念论丛-亚细亚诸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东京):六兴出版,1990 年,第 363 页。

④ 白鸟芳郎:《南诏及び大理の民族とその遗民-民家の言语系统について》,《民族学研究》15(3-4),292-303,1951-03-15;白鸟芳郎:《乌蛮白蛮の住地と白子国及び南诏六诏との関係》(云南の蛮族,乌蛮と白蛮とについて,1),《民族学研究》17(2),127-146,1953-03;白鸟芳郎:《南诏·大理の住民と爨·僰·罗罗·民家族との関係》(云南の蛮族,乌蛮と白蛮とについて,2),《民族学研究》17(3-4),247-274,1953-10;白鸟芳郎:《南诏问题研究の遍歴》,《上智史学》3(1),1959-10。

的语言和文化。通过一系列的论文,白鸟芳郎基本理清了南诏、大理政权的民族源流及其语言归属,并对南诏、大理政权的族群结构与各族群的语言类型及其与现代大理地区各民族及其语言的关系。

从研究方法来看,白鸟芳郎的南诏和大理史研究,明显受到其祖父白鸟库吉所开创的东京文献学派的影响,注重对唐代《蛮书》、元代《云南志略》等原始史料的辨析,力图还原民族源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采用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视角来分析南诏、大理的民族史和历史语言研究。在研究领域上,白鸟芳郎突破了祖父白鸟库吉所开创的满鲜史、北亚史、西域史的藩篱,开创了日本的华南少数民族史尤其是南诏、大理民族史的新领域,并逐渐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对东南亚民族的研究。1954年,他获得日本文部省研究经费的资助,展开“东南亚人文研究资料的基础调查”项目研究,并于1955年出版了《日本国内主要图书馆所藏西文东南亚文献综合目录》一书。

在其研究过程中,白鸟芳郎认识到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相关文献偏少,单靠历史学的方法难以进行深入研究,需要自觉运用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因此,白鸟芳郎有意识地在研究中吸收了欧洲特别是德奥文化历史学派的著名东南亚民族学家施密特、海内·盖尔德伦、科佩斯等人的成果和方法,注重实地考察。1957年,白鸟芳郎当选日本民族学协会理事,参加了该协会组织的首次东南亚稻作民族文化综合调查^①。1959年,白鸟芳郎受科佩斯和海内·盖尔德伦教授之邀,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民族学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并在《上智史学》发表《南诏问题研究之经历》(1959)一文。1962年,他以论文《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构成》获维也纳大学民族学研究所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欧美多国讲学游历。1963年回国后白鸟芳郎开办“华南文化史”讲座,带动了一批从事华南少数民族、东南亚民族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1967年,白鸟芳郎对泰国北部山地民族进行了初步调查,通过调查,他认识到泰国、越南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傣、苗、瑶等族与中国西南民族有密切关系,因此将其研究从中国西南民族扩展到东南亚民族,力图理清东南亚山地民族的谱系关系。从1969年到1974年,白鸟芳郎组织上智大学泰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查团,并邀请了江上波夫等著名学者,对泰国北部山地民族进行了三次调查,并出版了《东南亚山地民族志》(1978)一书,奠定了日本东南亚山地民族研究的基石^②。其后,白鸟芳郎还先后多次访问中国,并于1990年以72岁的高龄应云南省社科院和云南大学之邀,来云南从事洱海周边与滇池周域的历史学和民族学调查,并发起成立了“中日东亚南部民族共同研究会”,为中日南诏史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总体来看,以白鸟芳郎为代表的南诏民族史和历史语言研究,基本探讨南诏的族

^① 白鸟芳郎教授古稀纪念论丛刊行会:《白鸟芳郎教授古稀纪念论丛—亚细亚诸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第364页。

^② 金少萍:《日本民族学家对中国大陆的调查与研究》,《学术探索》1999年第1期,第68-72页。

群结构与各族群的语言类型及其与现代大理地区各民族及其语言的关系,奠定了日本南诏史的研究基础,并开创了民族学、历史语言学视角下的南诏史研究范式。

三、政治制度史取向下的南诏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

20世纪50年代,在白鸟芳郎对南诏史展开民族史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的同时,岩手大学的藤泽义美也展开了对南诏国政治史、制度史、都城史、民族史的全面研究。从1951年起,藤泽义美先后发表《剑南节度使韦皋的南诏对策》(1951)、《汉文化在南诏国》(1952)、《唐朝云南经营史研究》(1958)、《南诏的民族系统与哀牢传说》(1961)、《南诏国的统治阶层》(1962)、《南诏官制史考察》(1963)、《南诏国的都城》(1965)、《南诏国的建立与吐蕃之关系》(1966)、《南诏国家的构成与白蛮文化》(1967)、《南诏国的强制移民政策》(1967)、《南诏王权的确立与对吐蕃关系》(1967)等十余篇论文^①,对南诏与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南诏国的国家结构、政治制度、民族构成、都城变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1969年,藤泽义美将其二十余年的南诏史研究成果集结为《西南中国民族史研究——南诏国史的研究》一书^②,对南诏史进行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论述,成为南诏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西南中国民族史研究——南诏国史的研究》一书分前后两编,前编“南诏国建立史研究”分“大理盆地前史”、“昆明盆地前史”、“唐代云南的乌蛮和白蛮”、“六诏和南诏”、“南诏的勃兴”、“南诏王国的建立”等六章依次阐述南诏国建立的背景和过程。后编“南诏国史分论”分“南诏国的统治阶层”、“南诏官制史考察”、“南诏国的强制移民政策”、“南诏国的管理体制”、“南诏国的经济资源”、“南诏文化与汉文化”等六章依次阐述南诏国的社会阶层、官僚制度、民族政策、都城制度、经济结构、文化渊源等内容。两编之后有“南诏国建立年表”、“南诏王系表”、“索引”及各种图表。从内容上看,全书不仅对秦汉以来的云南地域族群和昆明、哀牢、滇等古国历史进行了历史性梳理,更对南诏国的建立过程及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宗教文化进行了结构

^① 藤泽义美:《剑南节度使韦皋の南诏对策——唐·南诏交涉史研究》,《歴史》(3),59-65,1951-09;藤泽义美:《南诏国に于ける汉文化》,《岩手大学学芸学部研究年报》3(1),41-52,1952-06;藤泽义美:《南诏国の仏教に就いて》,《东洋史学论集》(1),131-145,1953;藤泽义美:《南诏の民族系统与哀牢伝説について》,《岩手史学研究》(38),1961-10;藤泽义美:《南诏国の支配階層について》,《岩手大学学芸学部研究年报》20(1),15-45,1962-09;藤泽义美:《南诏官制の史的考察》,《岩手大学学芸学部研究年报》21(1),1-32,1963-06。藤泽义美:《南诏国の都城について》,《岩手大学学芸学部研究年报》(24),17-29,1965-03;藤泽义美:《南诏国の成立と吐蕃との関係》,《东洋史研究会》25(2),66-87,1966-09;藤泽义美:《南诏国家の構成と白蛮文化》,《歴史教育》15(5),63-70,1967-06;藤泽义美:《南诏国の强制移民政策について:王権确立期を中心に》,《東南アジア史学会会報》(4),7-8,1967-09-14;藤泽义美:《南诏王権の确立と対吐蕃関係》,《岩手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年报》(27),1-19,1967-12。

^② 藤泽义美:《西南中国民族史の研究-南诏国の史的研究》,大安出版社,1969-3。

性归纳,具有突出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从研究资料和方法来看,藤泽义美除了运用正史外,还运用了《南诏德化碑》等碑刻资料、《白古记》等野史资料及《南诏图卷》等图像资料,并承袭了东京文献学派的文本主义分析法,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辨。

总体来看,藤泽义美的《西南中国民族史研究——南诏国史的研究》是日本南诏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日本南诏研究的最高水平,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肯定。此书问世后,南诏民族史专家白鸟芳郎(1969)与日本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前田正名(1971)分别给此书撰写了书评^①,对其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除了藤泽义美之外,东京文献学派的第三代传人、爱媛大学的牧野修二先后发表《南诏国段氏之地位》(1959)、《南诏官制——以中央官制为中心》(1960)两文^②,分别对南诏国段氏的政治地位、南诏政权中央官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其研究与藤泽义美对南诏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相呼应,开创了日本的南诏政治制度史研究传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专业和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民族史专业的日本学者林谦一郎开始成为日本南诏史研究的生力军,他先后发表《南诏国的建立》(1990)、《南诏国后半期的动向:围绕对外关系》(1991)、《南诏国后半期的对外远征与国家结构》(1992)、《南诏、大理国的统治体制与支配》(1999)、《南诏、大理国的国家形成》(1999)、《南诏、大理国的建立与白人的形成》(2005)、《南诏王权的确立、变质与唐和吐蕃关系——和亲的意义》(2009)等系列论文^③,对南诏政权的建立、政治史和制度史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相较于藤泽义美,林谦一郎的研究更注重从南诏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唐与吐蕃关系变迁的视角来分析南诏政权的建立、制度的演变,从而推动了南诏的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此外,渡部武对《南诏图传》中耕作方式和技术的解读(1999),大原良通对南诏国王的铎鞘(2002)、小幡满对吐蕃的南诏政策(2002)的研究,立石谦次对《南诏图传》的校注(2002)、南诏国后半期的王权思想(2003)、南诏国对安南的侵攻及其对南诏统治结构

① 白鸟芳郎:《藤泽义美著「西南中国民族史の研究——南诏国の史的研究」》,《史学雑誌》78(10),59-67,1969-10;前田正名:《藤泽义美著「西南中国民族史の研究——南诏国の史的研究」》,《东洋史研究》30(2),110-119,1971-12。

② 牧野修二:《南诏国における段氏の地位》,《爱媛大学歴史学纪要》(6),1-22,1959-04;牧野修二:《南诏の官制——中央官制を中心として》,《爱媛大学纪要》第1部,人文科学6(1),1960-12。

③ 林谦一郎:《南诏国の成立》,《东洋史研究》49(1),87-114,1990-06;林谦一郎:《南诏国后半期の动向:对外関係をめぐって》,《东南アジア史学会会報》54(5),1991-05;林谦一郎:《南诏国后半期の对外远征と国家構造》,《史林》75(4),554-585,1992-07;林谦一郎:《南诏・大理国の統治体制と支配》,《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28),28-54,1999;林谦一郎:《「統一」を可能にしたもの——南诏・大理国の国家形成》,《アジア游学》(9),33-50,1999-10;林谦一郎:《南诏・大理国の成立と「白人」の形成》,《アジア民族文化研究》,63-71,2005-03;林谦一郎:《南诏王権の確立・变质と唐・吐蕃関係——和亲(公主降嫁)の意味するもの》,《唐代史研究》(12),57-87,2009-08。

的影响(2009)的研究^①,也拓展了南诏史研究的范围。

四、思想文化史取向下的南诏宗教史和艺术史研究

作为佛教重镇,南诏佛教很早就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藤泽义美在1953年就发表了《关于南诏的佛教》一文,阐述南诏佛教的发展史和宗派演变。不过由于关于南诏佛教的文献资料相对贫乏,因此日本学者关于南诏宗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直到最近几年,随着大量考古材料的发现,日本学者的南诏宗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才再次取得进展。

武田史子的《南诏·大理国的佛教》(2004)一文^②,着力于探讨南诏、大理政权的世俗王权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早期南诏王权的象征是铎鞘和灵剑,乌蒙诏通过夺取其他五诏的铎鞘来实现六诏的统一。第三代王异牟寻向唐朝称臣并献上象征南诏王权的铎鞘,其后的南诏王将佛塔状的铁柱重新塑造为新的王权象征,并通过在崇圣寺千佛塔顶设置金鸟像供民众崇拜、优宠高僧等方式,逐渐将世俗王权建立在佛教信仰的基础之上。森雅秀的《中国云南省的密教美术——南诏与大理残留的密宗佛》(2004)一文^③对南诏、大理密宗的佛教美术进行了探讨。今井净圆的《南诏·大理国时代的密宗遗物》(2005)一文^④,根据《唐书》、《南诏德化碑》、《南诏野史》、剑川石窟残存造像、《南诏图传》等多种类型的资料,系统梳理了南诏历代国王建立佛教寺院、崇信佛教的情形,分析了南诏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状况,探讨了佛教流行与南诏建国神话的关系,归纳出南诏佛教具有贵族主义、以观音信仰密宗为主、融合多元文化的三个主要特征,并对南诏密宗佛教现存的遗物进行了介绍。

总体来看,日本学界对南诏宗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南诏文化与唐文化、印度文化和吐蕃文化之间的关系,南诏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信仰,南诏艺术史等领域仍有较大的学术空间。

① 渡部武:《西南中国の在来契诸问题—唐代「南诏図巻」中の二牛拾楨図をめぐる》,《日中文化研究》(14),28-35,1999-01。大原良通:《南诏国王と铎鞘》,《Cultura antiqua》52(10),608-615,32-39,55,2000-10;大原良通:《八世紀における吐蕃の対南诏国政策》,《日本西藏学会々報》(48),3-15,2002-10。小幡満:《唐代会盟仪礼にみえる宗教と国際関係—唐・南诏間の貞元会盟を中心として》,《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学報》(48),111-122,2002。立石谦次:《史料研究「南诏図伝」文字卷校注》,《东海史学》(37),130-114,2002-7;立石谦次:《南诏国后半期の王権思想の研究—「南诏図伝」の再解釈》,《东洋学报》85(2),205-239,2003-09;立石谦次:《南诏国の支配构造:南诏国の安南侵攻を中心に》,《东南アジア学会会報》(91),14,2009-11。

② 武田史子:《南诏·大理国の仏教》,《史学》73(1),127-128,2004。

③ 森雅秀:《中国·云南省の密教美術—南诏と大理に残る密教の仏たち(上)》,《春秋》(457)16-19,2004-04。

④ 今井净圆:《南诏·大理国時代の密教系遺品について》,《种智院密教資料研究所紀要》(6·7),55-69,2005。

五、结语

回顾六十多年的研究史可以发现,日本南诏史的研究领域与内容、理论与方法,与日本的国家战略需要、国内外的学术潮流和相关史料的发掘都有密切的关系。总体而言,日本的南诏史研究深受“东京文献学派”的影响,注重将文本分析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将史学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相结合,以牧野巽、白鸟芳郎为代表的“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视角下的南诏民族史和历史语言研究,以藤泽义美、林谦一郎为代表的“政治制度史”取向下的南诏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相较于中国学术界来看,日本学界的南诏历史地理研究如南诏历史城市地理、政区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等则相对薄弱,而对南诏宗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也还不够深入和系统,仍有较大的研究学术空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期望通过对日本南诏史研究的分析梳理和归纳述评,能够促进中日南诏史研究的互动与交流,进一步推动国际范围内南诏史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Review of Studies on Nanzhao's History in Japan

Xi Huido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Northwest China,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Abstract: The Nanzhao studies of Japanese academia began at the end of the 1940s, and formed two research climax in the fifties to sixt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in the 1990s to the present. From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view, the Nanzhao studies of Japanese academia can be grouped into three main research areas: in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logy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e first research orientation, represented by Makino Tatsumi, Shiratori Yoshio, was the ethn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languages of Nanzhao, which concentrated on investigating the Nanzhao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languages of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languages in modern Dali area. Represented by Fujisawa Yoshimi, Hayashi Kenichiro, the second research orientation was the 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Nanzhao, which took the foundation, political system, social class, metropole changes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Nanzhao as its core content. The third research orientation, represented by Takeda Fumiko, Imai Joen, was the religious history and art history of Nanzhao, which concentrated on exploration of the Buddhism history of Buddhist art and relations of Buddhism and politic of Nanzhao. Based on full exchange with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Japanese scholars had achieved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n Nanzhao studies, but also there are inadequacies and the studies of Nanzhao still have great academic potential.

Key words: Nanzhao study; Japan; Ethnology; Political History; hisoty of thought and culture